

蔡元培文选

【注释本】



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
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

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
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

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蔡元培文选

【注释本】

聂振斌

选
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元培文选/聂振斌选注.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532-3

I. 蔡… II. 聂… III. 蔡元培(1867~1940)—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521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3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82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5.00 元

前 言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浙江绍兴人。乳名阿培,字鹤卿,别号鹤庵。在爱国学社时,常以“民友”为号,后改为子民,行于世。其先世于明朝末年由浙江诸暨迁至山阴(今绍兴市),初以艺山售薪为业,至高祖始经商。祖父廷桢,又名嘉谟,字佳木,曾任当地一家典当铺经理,以公正名闻乡里。父亲宝煜,又名光普,字耀山,当过钱庄经理。为人醇厚,素以宽让处友邻,有贷必应,对欠者不忍索,家中人常以“爱无差等”笑之。虽经商却赚不了大钱,故死后几无积蓄。母亲周氏,贤惠而能干。兄弟姊妹七人。兄元钺,字鉴清,曾在上海一家石印局任职。弟元坚,字镜清,做过绍兴钱庄职员。还有二位姐姐,均于未出嫁前病故,一弟一妹亦早殇。

蔡元培11岁时丧父,兄仅13岁,弟不过9岁。原本温暖的家庭,因突折顶梁柱而变得清寒起来。寡母少儿,生计艰难,从而引起亲朋好友的同情,其中更有乐善好施者倡议集款以贍其孤。周氏不愿受他人救济与怜悯,毅然谢绝。她变卖衣饰,克勤克俭,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独立负起教子之

责。她谆谆教导孩子们要自立,不依赖,不苟取,不妄言。小阿培聪明懂事,塾师认为有培养前途,督之甚严。所授功课,每非自习深夜,不能毕事。母亲常不辞劳瘁,陪坐案侧,时以温语慰勉。蔡元培一向具有勤奋好学的精神、坚毅朴实的作风以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与其父母的秉性及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些高尚的品格,在其后来的社会实践和革命活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为救国革命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实践活动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前 40 年。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变乱而痛苦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既黑暗又光辉的时代,蔡元培同许多人一样,走着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他既是封建主义旧教育的接受者,又是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创立者。在旧教育的诱导下,他一步一步地走进封建统治者的营垒,然而由于新时代的呼唤,他终于冲破这个营垒而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在革命道路上,他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一心救国革命,然而又常常为暗礁所阻或因自己不慎、甚至因自己过于老实而跌跤……

蔡元培既非“世家”出身,又无政治奥援,然而在科举的道路上却一帆风顺,步步高登。光绪九年(1883),年仅 16 岁的蔡元培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的生员,登上科举制的第一道台阶。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中了举人,登上了第二道台阶。第二年进京应会试,又顺利地考中,成为贡士,登上了第三道台阶。

光绪十八年(1892),蔡元培在科举考试最高而又最重要的殿试之考中又告捷,成为二甲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登上了第四道台阶。入翰林院,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能取得如此地位是极其困难的;取得这种地位,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光绪二十年(1894)蔡元培又应散馆考试,授职为翰林院编修。从此做大官,掌大权,已是唾手可得。然而,人各有志,蔡元培做了翰林院编修之后没有去谋求加官晋爵,而是一心读书和从事研究。他在京寓的书斋里写下这样一副条幅:“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很能概括他任职于翰林院时期的况味。翰林院不仅是封建王朝储备政治人才的地方,也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藏有各种图书、报刊,这极大地满足了蔡元培的求知欲。数年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报刊,留心世界时势,注意研究新学,使自己的认识一步一步提高,对清王朝的离心力也随之增大,终于与清王朝彻底决裂,投身到“排满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深孚众望的革命党人,时人誉之为“翰林革命”。

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残酷镇压下去,也从根本上断绝了蔡元培曾抱有的对清廷政治改革的希望。他虽非戊戌维新变法集团中的一员,却也因此携眷出京,弃官南下,回浙江办教育。他做出这一重大抉择,一方面是因为看清了清王朝的“无可希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吸取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他认为要改良政治、改造社会,首先必须培养大批具有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的人才,不能像康、梁那样,企图靠极少数几个人夺取政权,从而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这种急于求成的办法注定要失败。而要培养足够多的人才,就要兴办新式教育。他回浙江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和嵊县刻

山书院院长等职,是他推行新式教育的开始。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下半年,他把教育实践的活动中心由浙江转移到上海。在上海的五六年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不再单纯地办教育,而是把教育改革与“排满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教育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宣传科学民主、男女平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培养革命人才,组织反对清政府的革命社团。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与叶浩吾、蒋观云等人创立了中国教育会,被选为会长。名为教育会,实是革命团体。其后又发起参与创立由中国教育会支助筹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并任校长,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近世许多政治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都曾在这里任教或就读。光绪三十年(1904)冬,他与龚宝铨以及在狱中的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通过蔡元培的联系,浙江各处会党联合,均加入光复会,壮大了浙江革命力量。光绪三十一年(1905),统一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蔡元培又加入同盟会,并被任命为同盟会上海分部的负责人(主盟员)。其后他还参加了一个旨在刺杀慈禧太后和操持权柄的清朝大臣的暗杀团,为暗杀团集资赁屋造炸药。在上海期间,他还为“排满革命”的《苏报》撰文,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刊登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卖国的文章,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旨在鼓吹革命。暗杀团的成立以及蔡元培参加暗杀团,皆为虚无党思想影响的结果。他早期所写的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章《释“仇满”》与《新年梦》,就是刊在上述两种报纸上。

光绪三十三年(1907),40岁的蔡元培经人关说,随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去德国留学。靠当家庭教师 and 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稿所得支付学费和维持一家生活。先在柏林学习一年德

语,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三年。主要学习哲学、美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课程。蔡元培尤其对美学更感兴趣,深受康德观点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课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究,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页)这为他后来积极传播美学思想、提倡审美教育,并把审美教育确立为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了。消息传到德国,蔡元培十分高兴,立刻会见留德同学,准备回国。11月上旬回到上海,与黄兴、张謇、章太炎等人筹建中华民国代表会议。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总长(部长)。他一上任,就着手改革旧式教育,推行新式教育。3月,南方临时政府与宣统逊位后袁世凯把持下的北方军阀政府妥协,成立混合政府,蔡元培仍留任教育部总长。为全面实行新式教育,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从方针政策、学制、课程到实施方法、教师待遇等,都得以法律化、具体化。但是,由于袁世凯及其党羽大搞阴谋诡计,实行专制独裁,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蔡元培于是年7月愤然辞职。9月又携眷到德国留学。1913年3月,刚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又激化起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6月,蔡元培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参与研究对策。7月“二次革命”爆发,蔡元培接连发表文章,批判袁世凯,号召军民奋起讨袁。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蔡元培又携眷到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法的三年期间,他还同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创

办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在中国教育史和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1916年9月,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电请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1月蔡元培由欧洲回国,1917年1月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职后立即整饬北大,全面实践他的教育思想。他雷厉风行,师表群伦,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一个衙门式的极其腐败的京师大学堂焕然一新,成为全国瞩目的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的新文化中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于这样一位提倡科学民主思想、推行新式教育、坚决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专制的文化界的领袖,军阀们是十分忌惮与仇视的,打击、迫害时时袭来,迫使他无法立足于北京。所以,蔡元培从1923年到1926年长时间出国考察或参加各种国际性的教育学术会议,北京大学校长只是挂名而已,直到1927年才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1926年2月,他从国外回到上海,北洋政局日非,使他更无意北上。5月,时值北伐战争,他在上海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反对北洋军阀,积极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革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蔡元培由于对国内情况生疏,又不了解蒋介石其人,所以曾一度追随蒋介石反共,发表了一些反共言论,并在国民党政府中任教育部长、代理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与蒋介石一伙仅共事两年,他就发现自己与他们并不同路,从而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1928年他坚决辞去其他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极大地刺激了这位爱国者的心,促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挺身而出,公开反对自己党内的专制独裁者。其标志就

是1932年他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后，大胆地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揭露国民党监狱虐待政治犯的不人道行径，积极营救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

从1928至1940年，在十多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蔡元培再一次显示出他那知人善任、网罗众家的超人气度和杰出本领，把全国最有成就的学者专家聘请到中央研究院，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与才干，在极度艰难的岁月和战争的环境下，白手起家，惨淡经营，精兵简政，众志成城，取得斐然于世的成绩，为中国近现代科学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又做出卓越的贡献。蔡元培虽专心于学术，但对政治斗争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仍然十分热心。他从中央研究院的地位出发，敦促、联合政府有关部门（如教育部、外交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保护祖国的尊严和文化遗产。他谴责任何形式的投降主义，拥护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抗战期间，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蔡元培身患重病，有人劝他出国治疗，他婉然谢绝，坚决留在国内，为抗战出力。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没有看到祖国光复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便于1940年3月5日与世长辞了。

二

蔡元培的一生，在社会政治和学术、教育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个人兴趣说，蔡元培多次谈到他“性近学术”，对社会政治的组织领导工作乃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他虽然希望自己能够摆脱社会政治斗争的搅扰而专心研究自己感兴趣的

学术问题,但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国革命的社会责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不违背个人的意愿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正是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及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同时,这也是他的献身精神和高尚人格的重要表现。

蔡元培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艺术、文明史、人类学、民族学等等,他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涉猎。这众多学科中,他最感兴趣、最有建树的是美学与教育(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

蔡元培早期即1907年去德国留学之前,已经形成一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观。19世纪末期,随着进化论思想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兴起了学习“西学”(又称“新学”)的高潮。青年蔡元培当时虽然跋涉在科举仕途之中并跻身翰林院,但已经开始留意学习、研究西来的“声光电化”之学,接受进化论的影响,从而萌发了改良主义思想。他在翰林院的数年中所写的大量读书笔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1896年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写道:“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8页)。不过,这种改良主义思想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放弃了。他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期间,由于受到“排满革命”思潮的影响,他转变为一个革命论者,认为清政府不可救药,必须推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但新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在他的思想中还比较模糊。1905年加入同盟会之后,又经过多年的西方文化熏陶,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者,终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提倡科学民主思想,标举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纲领。这些观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在其

他学术文章中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

还有一点应特别指出,他青年时期接受了进化论,终生坚持进化观点,不仅用进化观点解释社会、历史,而且也用进化观点解释美学思想史,阐述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如本集所选的《美学的进化》与《美术的进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哲学上,蔡元培受康德的影响明显而又深刻。康德哲学分世界为“现象”与“本体”(又称“实体”)两个部分。现象即现实世界、物质世界;本体即观念世界、精神实体。二者截然不同,前者是相对的,充满各种矛盾;后者是绝对的、无差别的,因而是自由的。人们对本体世界的认识是先验的而不可经验,所以是一种“纯粹理性”;而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经验才能得到,他称之为“实践理性”。研究纯粹理性是认识论,研究实践理性是伦理学。要把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联系起来,只有通过感性的审美活动。美学是以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因此它是沟通认识理性(认识论)和道德理性(伦理学)的必需,从而构成康德哲学的完整体系。康德的这些基本观点,蔡元培都接受下来,成为他的教育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美育与人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蔡元培对美学、艺术问题,大都是从教育(美育)角度发挥的,他的美育思想的核心是康德的审美超利害关系说。他认为,美的性质一曰普遍,二曰超脱(见《美育与人生》——凡引本选集者只注明篇名,下同)。所谓“普遍”,是指美的对象不是个人私有,而是人人共有,如一个苹果,若作为观赏对象(美),可人人共见;若作为吃的对象,一人吃了,他人就吃不到。所以苹果作为食品,只有私有性而无普遍性。所谓“超脱”,就是超越利

害关系之上,人与对象只有形式关系,而无实质关系。这是因为,从对象方面说,美的对象是以本体世界之观念为内容,而以现象世界事物的表象为形式,形象虽与现实世界诸事物的形式相类,但其内在本质却与现实世界无涉;从主体方面说,审美主体是以一种不抱任何官能欲望和功利目的态度去观赏对象,否则,就不成其为审美。因为美有普遍性,所以审美活动能够泯灭人我差别,养成自由平等观念和博爱心理;因为美有超脱性,所以审美可以冲淡个体的占有欲和自私性,培养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这些都是救国革命所最需要的精神,因而蔡元培积极地、终生不渝地提倡美育,要“美育救国”。“美育”,蔡元培又称“美感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既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这一段话,足以反映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基本观点。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使他的美学思想与教育实践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曾给美育下了个定义:“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教育大辞书》第742页)。“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高尚而伟大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美育与人生》)。

在中国近代史上,蔡元培是“教育救国”论及其实践的杰出代表。仅此足以说明他对教育的重视。他认为,要救国革命,首

先要有救国革命人才,这种人才要有真实本领和献身精神;要改造社会,首先要改造人;要使社会进步,首先要培养足够数量的先进群体,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他说:“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第708页),因此要使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必须“切实从教育入手”。教育是百年大计,而非权宜之功,不能急功近利;“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其他因时势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用‘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同上书第704页)。教育的宗旨:“(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个宗旨包含着教育的内在关系及教育和政治的关系。

对于教育的内在关系,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批判地继承清末教育经验,提出公民道德、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世界观及美育五项方针。公民道德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中坚”,它一方面需要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教育中的知识的支持,完成一般道德教育目的,同时又制约着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教育朝向正确方向,不堕落为自私的、损人利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公民道德并不满足于“自他两利”的一般道德目的,还要进一步培养“舍己为群”的高尚道德。这种不计个人利害的高尚道德,就是实体世界之观念,亦即世界观;到达这种境界,必须通过美育来实现,因为美育是超越利害关系的情感教育,是连结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津梁”。到20年代,他总结新式教育的经验,把教育的内在关系归纳为德、智、体、美四个方面。把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改为智育、体育,把世界观教育纳入到美

育中。这个新提法简洁而更科学。这四项教育是养成健全人格、使人才全面发展必不可缺的。四者的关系,实质上与其以前的看法是一致的。以德育为中心,四项教育相辅相成。1930年,他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美育条目时写道,道德表现为行为,“顾欲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他有时还把教育归纳为科学教育与美术教育(即文学艺术教育)两大方面。他说,文化的内容,方面虽多,可以归宿到教育,“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美术的进化》)。“我们是做人,自然行为是主体,但要行为断不能撇掉知识与感情。例如走路是一种行为,但要先探听从那一条路走?几时到达目的?探明白了,是有了走路的知识了;要是没有行路的兴会,就永远不会走或走得不起劲,就不能走到目的。……所以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1页)。

蔡元培认为教育与政治既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教育是永久的,政治是暂时的;教育既是现象世界的事,又关乎本体世界;而政治则完全属于现象世界,专讲利害关系。因此他一贯反对把教育完全从属于政治,并针对封建专制和军阀政治桎梏教育,提出教育要超轶政治而独立。他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

政治之教育”(《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反对宗教把持教育,反对教会干涉教育之事。因为“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之条件”,与教育之普遍性和科学性相乖,因此要“以美育代宗教”(见《以美育代宗教说》)。

与教育思想紧密相联的是蔡元培的科学民主思想,也可以说,科学民主思想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精神。所谓民主思想,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以法治取代人治;在伦理关系上建立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领的道德体系,反对封建旧道德。而要发展民主思想,首先必须发展现代科学,以科学为思想武器破除封建迷信(包括宗教迷信),使国家制度及一切社会组织形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纳入科学轨道,这才是“现代精神”。他针对中国科学落后、缺乏现代精神的现状,感慨地说:“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对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有赖于诸君”(《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而要发展现代科学,不能满足于照搬、引进别国现成的成果,也不能只靠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建立自己的现代学术研究,才能真正“吸收”与“消化”外来的东西,继承与发扬优良传统,并以自己的新创造贡献于人类。他说:“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又说:“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

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的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为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

要发展学术,必须坚持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对待外国的经验既要大胆地“吸收”,又要善于“消化”;对待自己的遗产要批判地继承。这些主张是他成功地整饬北大、创办中央研究院的经验总结。这种学术指导思想,与他哲学上的中庸之道和折衷、调和的思想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他说:“《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和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经济学的早期译名)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1页)。又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同上书,第6卷第351页)。这些都说明,他接受了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影响。本集所选的《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一文更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蔡元培也认为接受一种思想或主义(不管是来自古代或来自外国),都要批判地“吸收”,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要择善